

劉永華，《程允亨的十九世紀：一個徽州鄉民的生活世界及其變遷》，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2024年，532頁。

傳統社會史研究多聚焦群體量化分析，對個體歷史經驗關注相對不足。微觀史學從個體生命史切入，通過個案深描，揭示社會關係網絡，彌補了宏觀視角的局限。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劉永華的新書《程允亨的十九世紀：一個徽州鄉民的生活世界及其變遷》，講述了發生於19世紀徽州一個普通鄉民的生活世界。書中在細緻解讀這個主人公及其家人留下的長達40年的排日帳的基礎上，管窺當時時代的不同面向，思考這一小人物的生命經驗與長時段歷史進程之間的交錯關係。

本書共有18章，以主人公程允亨的生命歷程為順序展開，旨在以程家為個案，追問19世紀中國鄉村經濟的演進趨勢與內在動因。在導論中，作者梳理了學界對於19世紀鄉民生計、鄉村社會與文化的研究，提出嘗試基於一個鄉民的生活世界去審視這些學者們在各自領域中提出的見解，並對如何開展本書的個體層次研究做了交代。在導論的最後，作者對於使用的核心史料「排日帳」做了說明，排日帳是流行於婺源境內的一種民間歷史文獻。所謂「排日」，是指這種文獻逐日記錄的書寫格式，而「帳」是指它記錄了日常的收入和開銷（頁25），作者發現的15冊排日帳是由一家農戶的祖孫三代所記，時間跨度從道光十八年（1838）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除第一章導論外，本書共16章，可概括為6個部分。

第一部分由第二章至第四章構成，主要論述程家所在地域的總體狀況，討論太平天國運動前、運動期間程家的生活。第二章主要介紹本書討論地域的生態環境、生計傳統與村落景觀（頁24），這些構成程允亨生活世界的自然與人文環境。程家所在的沱川，位於中國東南的徽州婺源縣北部，當地由於山多地少，許多家庭在不同程度上介入了工商業，這種生計傳統有助於理解程家的生計模式。第三章介紹了程允亨父輩的社會經濟生活，程允亨日後的生計模式，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至他的父輩。自19世紀30年代後期至太平天國前期，允亨的父輩在從事農田耕作的同時，也投入了大量的時間進行小商品的販賣，這些生計活動為開發（允亨的父親）成家與生子提供了經濟基礎。第四章承接上文，討論允亨出生後度過的少年時代及戰亂對徽州社會經濟的衝擊。允亨童年和少年時代的前期，徽州曾經歷戰火，而程家所在的沱川，位於婺源北僻遠處，受破壞較小，排日歷中並沒有直接記載太平軍對於程

家生活的衝擊，但是通過對當時米價、茶價的分析，推測程家的生活狀況是趨於惡化的。

第二部分由第五章至第九章構成，討論太平天國運動結束後程家生計活動的諸方面。第五章聚焦於程家農田耕作、茶葉種植與製作、山貨採集與販賣等方面，分析了這些活動安排的時間週期、勞動力與現金收入，程家的社會經濟活動，主要涉及租佃與雇傭兩種關係，這種生產關係在太平天國運動結束後出現了變動。第六章探討的是此時期程家生計模式的調整。此時允亨已經成年，排日帳的執筆人也已經變成了他，通過他的記載可以看出程家生計模式的改變，即不再進行食鹽等商品的販賣，而是投入更多時間在與糧食種植有關的活動，家庭規模擴大也使程家在農田耕作上投入更多勞動力，糧食產量也有所提高。這些變化為之後程家蓋房與娶親積累了資金。第七章作者利用「全家最低消費籃子」與家庭收入進行比較，觀察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運動前後程家生活水準的變化，還發現程家對市場的依賴程度很高，其市場交易活動範圍大且相對分散，超出了施堅雅提出的「基層市場圈」（頁174），此外通過排日帳中的糴米記錄可以觀察到「信用空間」的問題。第八章重建了程家的飲食、衣着、家具、燃料等方面的情況。由於排日帳中的記載難以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部分記錄缺少的情況下，作者利用學界對此的研究加以連綴補足。第九章着眼於與生計活動密切相關的行動空間，作者通過分析發現沱川之外的區域也在程家的生活中佔據了重要地位，程家的生產活動圈與婚姻圈、市場圈不完全重疊，程家的商貿活動有時會突破生產活動範圍，這個個案體現出中國傳統鄉民在空間上是具有較大流動性的，作者在這個層面上與施堅雅、費孝通提出的概念進行了對話。

第三部分由第十章至第十二章構成，這一部分側重從社會組織與人際互動兩方面進行討論。第十章討論程家的家庭生活，分析了「排日帳」中所見的夫妻、父子、母子關係的記錄，還簡要論述了婦女在程家扮演的角色。第十一章考察程家所在地域的社會組織，特別是宗族與村落。作者認為程氏的宗族與弗里德曼的A型宗族較為接近（頁264），宗族的影響不僅體現在程家對宗族公共事務的參與，如重修祠堂、舉辦儀式等，還體現在日常生活中，如年節行事和人生禮儀方面。通過排日帳的分析可見，19世紀中後期，家庭、宗族、村落和跨村落組織在當地依舊發揮着重要作用，沱川地域的社會組織看不出明顯的變動跡象（頁281）。第十二章討論程家的人際關係與人際互動，揭示了宗親與姻親、朋友之間的若干差異，宗親更多限於幫

工或宗族事物，而姻親、朋友則多橫跨禮物、經濟往來等多方面，更為活躍和直接。

第四部分由第十三章至第十五章構成，討論的主題是程家生活世界的文化面向。第十三章透過討論年節行事、時辰觀念、村落空間、居住空間等，考察徽州鄉民的時空感知。通過分析可見，除了舉行儀式外，時辰對於程家而言並不重要，時辰只是偶爾進入普通鄉民的生活；在聚落空間方面，文章透過對沱川風水形式、理坑水口營造和儀式空間的討論，可以大致推測他們感知聚落空間的方式（頁339）；書中還討論了程家民宅的格局及營建新房需求。第十四章探討程家參與的宗教儀式及與此有關的社會文化活動，如前往齊雲山進香、疾病與治療的方法、閒暇時的娛樂活動，如看戲等。第十五章通過對排日帳使用的單字、句法、以及語言特徵分析，討論了程家三代的讀寫能力，以及文字與書籍在其生活中的地位。本章的討論顯示出19世紀文字已經滲入徽州的鄉村地區，文字的書寫和閱讀很可能已經成為普通鄉民日常生活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頁392）。

第五部分為第十六章，探討的主題是鄉民與王朝國家之間的關係，着重考察程家與晚清王朝國家及其代理人之間的關係。在錢糧繳納方面，書中分析了程家從道光十八年至光緒二十七年交糧地點變化背後的歷史背景，展現了清代婺源賦稅徵解體系從自封投櫃制到包徵包解制，徵解主體下移的變化過程（頁405）。在糾紛調處上，沱川的鄉約已經與宗族結合，形成了體系和制度化。壇廟祭祀方面，徽州鄉村對社、厲壇的祭祀，已經融入當地的風俗，通過間接的方式為如允亨這樣的普通鄉民提供學習政治運作的契機。

第六部分由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構成。第十七章主要考察程家的生計困境及其應對方式，並交代程允亨去世的情況。作者通過分析發現，程家生計危機的出現，主要原因不在於太平天國運動帶來的米價、茶價的波動，而是經年累月的借貸已無力償還。最後一章為本書結論部分，對本書各章的認識進行歸納，並總結了19世紀經濟、社會、文化方面的時代變動。作者發現程家生計經歷的發展軌跡難以套用學界現有的模型來理解，由於程家多樣化的生計方式，程家既沒有遭遇明顯的內卷化困境、也沒有陷入高水準均衡陷阱（頁457）。

整體而言，本書以程允亨的一生為主要線索，全面考察了其生活世界的不同面向，為理解19世紀中國鄉村變遷提供了一個真實且有一定深度的個案。在史料運用上，本書的核心材料排日帳，目前史學界使用較少，尤其是

立足於排日帳來分析小農的生產生活的研究較為欠缺，這一方面是因為排日帳所存的體量有限，另一方面由於排日帳的記錄較為細碎，從何種方向加以解讀顯得十分重要，本書就為如何解讀這類文本進行了有益的嘗試。

在寫作方法上，本書借鑑了林耀華《金翼》的寫作策略，將個體生命歷程的微觀考察，置於宏觀歷史脈絡之中進行雙重觀照。這樣既可以觀察歷史進程對普通民眾的影響，又可以通過對個體生命歷程的考察，捕捉宏觀、中觀分析難以洞察的歷史細節。劉永華從時間、地點、人物、行為出發，對文本進行解讀，並按若干主題進行分類和統計，再對其進行歷時性分析，在討論的過程中還將其置於商業發展、制度變化、重大事件的發生等背景下，力圖通過這個小農的視角去觀察和理解19世紀中國鄉村的變遷，使得該作在具有學術性的同時兼具可讀性，其寫作方法值得學習和借鑑。

最後，關於該作，筆者認為有兩點值得商榷之處。其一是對於排日帳中部分記載，作者或有過度解讀之嫌，如作者在論述程家的人際關係時，指出程家在新房營建期間與各類工匠產生了頻繁的互動，這種互動較平日更多，認為「這一動向與19世紀中後期當地的社會經濟變動密切相關」（頁307），但作者並未展開論述這一相關性，實際上程家與工匠的互動，主要是圍繞新房營建，這種互動應當是圍繞需求自發產生的。其二，由於史料和個案自身的局限，本書難以與一些理論展開深入對話，個案的解釋力有待商榷。例如書中在討論程家的生產經營時，指出程家除了耕種自有、租入的土地，還投入不少勞力開墾荒地，以求提高耕地面積，農戶將勞力持續投入一塊農田之中的「自我剝削」情況沒有出現。同時他們在農田耕作之外，還有其他的出路：他們投入許多勞力進行茶葉生產，還販賣食鹽、山貨及各種小商品，並從事挑擔等活動（頁94—119）。由於程家生計的特殊性，其對市場的依賴性很強，程家日常使用的許多物品是從市場購買的，甚至程家的口糧有將近一半來自市場。這些情況，都很大程度上有別於伊懋可、黃宗智討論的農民群體，（參見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00）。因此，他們無需「自我剝削」，也「卷」不起來。儘管文中可以看出程家的情況與德·弗里斯提出的勤勉革命說有一定契合之處（頁149），但這些證據過於薄弱，還不足以得出明確的認識。

韓佳樂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